

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许钧的翻译文化观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ivilization Exchange: Xu Jun's Cultural View on Translation

蓝红军 (Lan Hongjun)

内容摘要：翻译观是影响翻译行为及翻译价值实现的重要内在因素。它普遍存在于译事主体之内，但人们未必对之形成认识自觉。翻译家许钧作为一名具有明确观念自觉的翻译工作者，他坚持以人的文化为翻译最高目的，保持人的精神主体性在文化翻译活动中始终在场。其翻译文化观不但指引其自身的翻译行为，而且成为引领中国译学发展的显著力量。在翻译工具日渐冲击翻译人主体性的当下，梳理许钧的翻译文化观，揭示一名中国当代翻译家成就获取的内在机制，能为新时代广大翻译从业人员认识人如何在翻译活动中发挥主体作用、彰显翻译活动价值提供思想启发。

关键词：翻译文化观；许钧；文化交流；文明互鉴

作者简介：蓝红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译学理论批评与翻译思想史。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翻译思想发生机制与发展路径研究”【项目批号：23BYY119】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ivilization Exchange: Xu Jun's Cultural View on Translation

Abstract: Translation view is an important internal factor that determines translation behavior and realization of translation values. It is present in every subject involved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but may not necessarily be aware of. As a distinguished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 being quite conscious of his own translation view, Xu Jun takes serving human culture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emphasizes the presence of spiritual subjectivity in them. His cultural view not only guides his own translation behavior, but also becomes a leading forc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During a time when technology challenges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 translators, investigating Xu Jun's cultural view on translation and the inner mechanism of his achievement will hopefully help many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to realize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human subjectivity and manifest values of translation in their respectiv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Keywords: cultural view of translation; Xu Ju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ivilization exchange

Author: Lan Hongjun, Professor at th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The concentration of his study is on translation theory criticism of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Email: alan.lan@163.com).

翻译观是人们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翻译活动的总的看法,是翻译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¹任何从事翻译活动者,都有其翻译观,或显或隐。当下翻译实践形态正在发生变化,翻译行业发展迅速,翻译主体的翻译观意识越来越明晰。同时,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人们对翻译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观看翻译的视角日趋多元。翻译的“哲学观、科学观、艺术观与历史观”(方梦之 33),以及符号学翻译观、逻辑学翻译观、语用学翻译观、阐释学翻译观、解构主义翻译观、文化翻译观²等林林总总,极大地推动了对翻译复杂性的揭示。古今中外,人们表述过对翻译的看法可谓多矣,不过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元”翻译观却并不多,翻译文化观就是有关翻译的基本观念之一。无论是研究个体翻译思想,还是认识时代翻译精神,我们都离不开对翻译家之翻译文化观的讨论。

许钧是一名与翻译有着“历史的奇遇”的翻译人,无论是翻译实践,翻译教学,还是翻译研究,都成就不凡。他通过各类翻译活动见文化、译文化、论文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其翻译文化观,表达了一名翻译工作者对促进平等文化交流与维护文化多样性的深切关怀。认识许钧的翻译文化观,不仅具有认识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家之翻译思想的学术价值,更具有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家精神的时代意义。许钧何以如此关心翻译的文化维度?其翻译文化观有何具体所指?其翻译文化观产生了哪些历史和现实的影响?这些应该是众多想要从许钧身上获取榜样经验及榜样力量的翻译从业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许钧关注翻译之文化维度的缘起

翻译观作为个体秉持的对翻译的看法、认识、态度、价值观,其形成是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它既受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也是个体根据自身知识背景和实践经验,通过观察和思考,自觉选择的结果。许钧的翻译文化观并非一日而成,更非偶然而就。从其学术历程看,许钧早于1979年就发表了学术论文,探讨的是法语语法新现象,关注的是语言层面的问题。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许钧开始持续不断地发表翻译文化方面的文章,讨论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关系处理、译者对待异语文化的态度、翻译

1 参见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2 参见杨仕章:“文化翻译观:翻译诸悖论之统一”,《外语学刊》4(2000):67。

的文化价值、翻译研究的文化观、数字化时代的中国文化译介等诸多主题。这表明，他的研究经历了从文字、文学到文化的视野拓展。自此，翻译的文化维度一直是他思考的对象。结合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的时代背景以及许钧个人的翻译活动经历，大致可从外部环境与个体经验两个方面解释许钧关注翻译文化维度的原因。

1、对翻译研究范式的反思

20 世纪 70 年代末，许钧受公派至法国留学两年后回国任教。彼时正值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翻译学者开始向语言学寻求理论资源和方法借鉴。以奈达（Eugene A. Nida）、卡特福德（John Cunnison Catford）、纽马克（Peter Newmark）、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等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的学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进入中国，对中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将中国翻译学者从传统的、强调体悟和灵感的语文学研究范式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引发了中国译学界对现代语言学的关注，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成为了主流范式。

这一范式将翻译学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视语言学理论为翻译研究唯一合法的理论基础，重视以自然科学的模式和方法，去探求语言符号等值转换过程中的规律。这就导致翻译研究偏于文本语言的内部结构，而缺少对文本外部要素的关注。正如有学者所言，研究者“必须把一切情感的考虑、审美的考虑都撇在一边”（邓晓芒 104）去看待事物，结果无法看出对象的合目的性。易言之，用科学主义的简单性原则和还原论方法看待翻译研究，很大程度上会将人的主观情感与审美等因素排除在外，人们凭此很难看到翻译活动中人的存在，以及翻译活动之于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20 世纪后半叶，文化研究在西方兴起，解构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等思潮迭起。人们开始反思语言学翻译研究的不足，将视野拓展至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将不同时期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体制”（刘军平 394）等因素纳入翻译考察的范围，“力图对诸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文本外因素等语言学途径难以深入分析的问题及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翻译现象提供解释”（许钧，“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 6），这拓展了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增加了人们对复杂翻译现象的理解。

许钧一直都重视文学翻译中的语言问题，但他在肯定语言学范式翻译研究的同时，也对其不足保持着反思的态度。20 世纪 90 年代，许钧对翻译活动中文化因素的关注明显增加。这与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大致同时发生，不过与之不同的是，许钧关注的并不是如何以文化解构语言，而是如何将翻译中的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建构世界。从 1996 年“文字·文学·文化——关于‘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一文可见，许钧不但看到了文学翻译活动对象自下而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译者所译的文学是“文字的艺术”，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表达了他对译者处理双语文化态度的见

解——翻译作为文化沟通的中介，要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尊重双语文化，其目的关键在于“能否达到交流与沟通”（168-169）。此后的“文化‘差异’与翻译”（1997）、“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1998）等文章都不同程度表达了许钧从文化层面对翻译的认识与思考。

2、对他者文化的感受与体验

近半个世纪以来许钧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的历程，是他不断吸收、反思自身的“他者”文化体验，并将之与读者、与业内同行交流的过程。

首先，通过翻译实践体认到翻译的文化桥梁作用。许钧1976年被公派至法国布列塔尼大学留学，留法期间“读了不少法国经典文学作品，还经常到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去淘书”（许钧，“我的翻译与研究之路”34）。他因此既接触到了莫里哀、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雨果、左拉、普鲁斯特等经典作家的作品，也关注到了萨特、加缪、尤内斯库、贝克特、勒克莱齐奥、图尼埃等新锐作家。¹1978年回国后，许钧喜遇国内改革开放的“好季节”与外国文学热，欣喜之余产生了向中国读者分享法国文学之美的热切冲动。当时的译者资格门槛、原作理解困难，非但没有阻挡他的翻译热情，反而成为他与出版社、作家等建立联系并搭建桥梁的开端。自1982年出版第一部译作《永别了，疯妈妈》之后，许钧后续翻译出版了《诉讼笔录》《追忆似水年华》（卷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三十多部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他通过翻译实践，维系了与出版社、作家等多方之间的良好互动，也获得了读者的喜爱与信任。这些预期内外的种种积极体验，让许钧愈发意识到翻译由文字转换至促进中外交流的重要文化价值。

其次，因研究翻译而深化了对翻译的文化认识。对于许钧而言，选定某个观看翻译的视角，正如选择翻译某位作家和某部作品一样，需要了解与认同。1991年，许钧应邀翻译发表了法国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翻译的理论问题》（*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1976）一书部分章节。穆南虽属语言学派，但显然关注到了翻译活动中的因文化导致的翻译障碍，以及文化问题的类型等²语言外部的的问题。从1997年“文化‘差异’与翻译”一文看，翻译穆南的理论增加了许钧对翻译中文化因素的认识。2002年许钧明确阐述了其“翻译文化观”，其中可见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的“翻译的文化意识”，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观”，以及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的“翻译文化观”对许钧“翻译文化观”形成的理论影响。梅肖尼克“从历史性角度揭示了在翻译活动中文化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勒菲弗尔拓展了翻译研究“语言之外的历史与文化维度”，贝尔曼“把翻译与文化传播结合起来”探讨翻译在文化之间所起

1 参见许钧：“我的翻译与研究之路”，《外语界》5（2018）：34。

2 参见乔治·穆南著：“翻译与文化的多样性”，许钧译，《语言与翻译》1（1991）：73-77。

的作用“开辟了翻译文化史的研究途径”（许钧，“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观”222），从理论上确证了许钧个人的翻译体验，并深化、拓展了其翻译经验认识。可以说，许钧选择文化视角，是个体翻译经验与理论的契合。

二、许钧翻译文化观之内涵

从文化维度观翻译，许钧不是第一人，但他有其自身的判断与考量。同翻译文化学派之前早已存在的“文化翻译”¹一样，许钧意识到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存在、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但是与“文化翻译”关注等值转换的方法不同，许钧尤其关心翻译活动主体对待源语与目的语文化的伦理。同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一样，许钧认识到以纯粹语言科学的视角看待翻译问题对历史、社会、人文等外部因素的遮蔽，但是与文化学派注重对翻译历史上意识形态、赞助等外部“操纵”因素的客观描写与解释，倡导阻抗式翻译不同，许钧尤其关注揭示翻译活动对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价值。“伦理”与“价值”皆以人为最终指向，显示出许钧翻译文化观对人在翻译活动中在场的高度关心。

1、许钧的翻译文化价值观：文化传承、文明互鉴

翻译有何等价值？答案取决于人们从何种层面思考翻译的目的。如果把翻译存在的目的视为一个由高低级别不等的目的构成的系统，“为国家富强”、“为个人幸福”、“为赚钱、娱人、娱己、搞对象”等²，都是翻译活动体现其于国家、社会或个人价值的合理选项，区别在于价值的高低。作为最早系统论述翻译价值的学者，许钧也曾多次表达自己作为一名译者与原文作者精神契合、与伟大的心灵神交的幸福，但许钧的翻译价值观，着眼点鲜少在于个人。他从翻译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与历史价值五个方面，详述过翻译的交流、传承、沟通、创造、发展功用³，目光在于国家与人类文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1）语内翻译与文化传承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论及佛经翻译以前的中国古代翻译文学时，将翻译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今翻古”，另一类是“以内翻外”。⁴其所指大致相当于四十多年后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的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此两种区分，恰好揭示了翻译之于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时间（纵向）与空间（横向）维度。

以今翻古的语内翻译，在梁启超看来是因为“语言易世而必变”“古书非翻不能读”（梁启超 160），说明他认为语内翻译的价值主要在于帮助下人读懂古书。这大体是在语言层面认识语内翻译的价值。许钧受季羨林中

1 参见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5页。

2 参见曹明伦：“文本目的——译者的翻译目的——兼评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和意大利谚语‘翻译即叛逆’”，《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4（2007）：2。

3 参见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66-429页。

4 参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60页。

国文化长河通过翻译印度、西方得以注水长流之说的启发，提出如下观点：

〔……〕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许钧，“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 7）

许钧上述观点是他从文化层面对语内翻译之于民族文化遗产与发展价值的直接表述。许钧与梁启超就语内翻译价值认识的差异，明显源自其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如果翻译仅仅是语言转换，今人翻译古书，不过是用今人的语言替换古旧的表述以完整再现古人之原意。当下读者懂了，目的即已达成。许钧认识到的翻译不止于此。在他看来，一代代的译者在理解与表达古书的过程中，必然含有译者各自的视域与见解。古代经书经过世代“今人”的阐释，使得传统得以维系的同时也在后人的新视域、新见解中得以拓新和发展。

（2）语际翻译与文明互鉴

语际翻译之于文明互鉴的价值，古往今来案例不胜枚举。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翻译史。希腊人通过翻译从巴比伦文明中“学到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犹太人学到了神学，阿拉伯人学到了建筑学”（刘军平 53）；没有翻译就没有哥特语字母表、亚美尼亚语字母表、格拉哥里字母表、西里尔字母表、克里语字母表的产生¹；影响欧洲文化的圣经“根本就是一部大译书”，“没有翻译就没有基督教”，“同理也就没有佛教”²。

就中国文化而言，梁启超从以内翻外的实践中看到了佛经翻译促使中国“国语实质之扩大”、“语法及文体之变化”、“文学情趣之发展”的作用³，季羨林用注水长流说生动表明了外译中为中国文化输入发展力量的意义⁴。许钧十分认同语际翻译之于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与此同时他也明显认识到翻译文化影响的交互性。

2019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许钧撰写多篇文章表达了翻译之于五四运动、之于中国文化革新的重要意义，并旗帜鲜明地将翻译根本上视为一种本我向他者开放的深层次双向交流，将那种“敢于打开封闭自我，在与‘异’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丰富自身的求新的创造精神”（“翻译精神与五四运动” 9）视为翻译精神。这一方面表达了许钧对以内翻外活动促进中国文化革新发

1 参见 Jean Delisle and Judith Woodsworth,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2, 3-22.

2 参见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148页。

3 参见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91-195页。

4 参见 季羨林：“序”，《中国翻译词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页。

展价值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许钧从看似“利己”的以内翻外活动中，看到了其延展异语文化生命的价值，看到了任何一种翻译活动文化影响的双向性与交互性。他认为“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 7）。

也正因意识到任何一种语际翻译活动影响的双向性与交互性，许钧面对不少人对当下主动进行的中译外活动之价值与有效性心怀疑虑，他并不怀疑以外翻内活动的价值。许钧肯定了中译外之“中国选择”与“中国阐释”对于构建系统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作用¹，也列举成功的历史经验说明主动外译完全可能“丰富而卓有成效”，能够获得译入语文化读者的肯定，并有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²不过他也提醒人们，语际翻译要“警惕文化霸权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保持宽阔的视野，避免单向的翻译观和狭隘、急功近利的翻译心理。³

2、许钧的翻译文化伦理观：弘扬翻译精神

如何处理或看待翻译活动中自我和他者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直指翻译活动主体内心遵从的道德与伦理。如果翻译仅仅是语言转换，忠实便是最高且唯一的伦理。不过忠实本身含义多元，在何种层面忠于什么，理解见仁见智。1813年，解释学先驱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提出了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并表示他倾向忠于原作特性的异化翻译。⁴19世纪60年代，纽曼（Francis Newman）在认可施氏异化翻译的基础上，突破其民族主义取向，倡导尊重文化差异、遏制文化霸权和民族主义的异化翻译。⁵这些尊重差异的翻译观念在1984年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论述中得到重申。贝尔曼认为，系统消除原作差异的译本是糟糕的翻译。⁶他提倡尊重原作异质性的翻译伦理，后续得到了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西方翻译学者的响应⁷，也影响了许钧。许钧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凝

1 参见许多、许钧：“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3（2015）：14。

2 参见许钧：“关于深化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几点意见”，《外语与外语教学》6（2021）：69。

3 参见许钧：“中西古今关系之变下的翻译思考”，《中国外语》4（2015）：1。

4 参见刘军平、覃江华：《西方翻译理论名著选读》，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11-634页。

5 参见刘军平、覃江华：《西方翻译理论名著选读》，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45页。

6 参见 A. Berman,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translated by Stefan Heyvaert,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5.

7 参见刘云虹：“翻译价值观与翻译批评伦理途径的建构——贝尔曼、韦努蒂、皮姆翻译伦理思想辨析”，《中国外语》5（2013）：84。

练并提出出了他不断倡导的“翻译精神”。

(1) 敞开自我，与“异”交流

翻译必然意味着与语言之异、文化、思维、世界之异¹的接触。敞开自我，往往不是翻译之初常见的文化态度。汉代佛经初传，虽有部分汉人信仰，但是汉人正式出家是严令禁止的，为了减轻文化戒备与排斥，佛经翻译常以中土儒家思想比附；16世纪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传教之初更是进退维谷，一边面对的是视非天主教民族为魔鬼的欧洲人文主义与狭隘亚利安民族主义，另一边还要面对“宁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中国卫道士。²然而，文化交流一旦产生需求，其力量是强大的。由翻译引领的文化交融、自省与革新，随着门户的敞开会深入每一片文化领地。

许钧依据个人的翻译活动经历，以及他对翻译历史经验的领悟，深刻意识到积极开放自我的重要性，并因此大力提倡本族文化敞开自我，主动与异语文化交流。就个人而言，许钧认为正是积极开放的交流心态，让他得以与出版社、原文作者、译文读者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产生翻译学术发表的动力，并在中法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一名翻译人的桥梁作用；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化人物而言，鲁迅借助翻译吸收新思想、新表达、改造国人思维，赵元任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锻炼白话文表达能力，王小波创作受王道乾、查良铮译文滋养，叶兆言从傅雷译巴尔扎克作品中窥见汉语表达的奥妙³，无不说明主动敞开自我，译入异语他者丰富和发展本族文化的重要作用。

敞开自我，实际是在充分接纳与认识自我的基础上，对不断发展自我的追求与渴望。许钧十分认同周恩来总理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表达的观点——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⁴他撰写多篇文章纪念10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均可视为他对中华文化主动拥抱翻译精神的赞扬。因为在他看来，翻译根本就是本我向他者开放，翻译精神就是那种敢于打开封闭自我的开放精神。

(2) 尊重他者，平等对话

翻译人如何对待他者的文化，在许钧看来，“无视”、“轻视”或“仰视”他者，都是需要克服的态度。⁵

他者即意味着他异性，尊重他者就是对文化异质性与多样性的维护。正

1 参见 刘云虹，许钧：“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2016）：71。

2 参见 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 参见 许钧：“在抵抗与考验中拓展新的可能——关于翻译与语言的问题”，《语言战略研究》5（2019）：6。

4 参见 许钧：“我的翻译与研究之路”，《外语界》5（2018）：34-39。

5 参见 许钧：“文化‘差异’与翻译”，《中国比较文学》1（1997）：69。

如前文所述, 敞开自我往往不是翻译之初常见的文化态度, 同样的, 减少甚至消除他异性是双语接触初期翻译活动中的常态选择。两晋时期佛教领袖道安、慧远等“用王弼、何晏等人‘贵无’学派的思想体系去解释般若”(任继愈 12), 是以格义的方式削减佛经思想的他异性; 16 世纪利玛窦选择事先翻译科学知识以吸引中国进步知识分子, 是以翻译选材缓解天主教在中国接受的异质程度; 19 世纪初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努力学习中文完成汉译《圣经》, 是以逆向翻译消除《圣经》在中国接受的语言异质性。直到施莱尔马赫提出倾向异化翻译,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视留存异质性的翻译为语言与生命的救赎¹, 贝尔曼视消除他异性的翻译为违背伦理的糟糕翻译, 韦努蒂将异化翻译视作抵抗文化霸权的手段, 人们才逐渐反思消除他异性的翻译对原作语言及文化施加的“暴力”以及相应造成的语言文化损失。

许钧认为, 接受者文化和语言对外来文化和语言的异质性表现出“反抗”或“冲突”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如何对待他异性, 需要人们对“异”的价值有充分的认识, 对输入与输出异质文化保持平等互惠的态度。首先, 从译入的角度看, 人们需要认识到, 翻译吸收异质文化, “不是为了扼杀民族文化”, 吸收异质表达方法, “不是为了丧失母语的纯洁与本色”, 而是在保持自我立场的前提下丰富、发展自我; 从输出的角度看, 同样需要认识到, 不能为译入语文化提供异质的东西意味着本身交流价值不高, 难以接受译入语文化的考验。其次, 没有平等互惠的翻译态度, 同样不利于文化交流。罔顾对方需求盲目野蛮进行“侵犯”是许钧不赞成的态度, “在平等的基础上, 互通有无, 达到互利”是他认为翻译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应当遵守的原则。²在许钧看来, 翻译旨在构建的, 应当是一种“一种亲密无间、相互对等、彼此信赖、开放自在的”自我与他者关系。³

作为一名翻译人, 许钧也是他自身倡导原则的践行者。中外文化如何能够经由翻译进行平等互惠的交流, 在许钧的著述以及个人实践活动中有着极为丰富和生动的体现。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诉讼笔录》《追忆似水年华》(卷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三十多部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 通过翻译把优秀的法国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 丰富中国读者对文学的认识的同时, 也在时空上拓展了法国文学的生命。与此同时, 他也密切关注中华典籍与中国文学的外译, 为中译外的价值认识与有效性实现路径提供思想指引。此外, 许钧还积极组织勒克莱齐奥、莫言、毕飞宇、余华、方方等中法知名作家进行交流, 让中法作家增进对彼此了解的基础上, 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

1 参见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第 257-258 页。

2 参见 许钧, “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 《中国比较文学》3 (2001): 87-88。

3 参见 许钧, “文化‘差异’与翻译”, 《中国比较文学》1 (1997): 73。

三、许钧翻译文化观的意义

许钧从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角度表达了其翻译文化价值观，从翻译活动应当保持的自我与他者文化态度表明了其翻译文化伦理观，反映出他对翻译活动之中“人”的密切关心——以人的文化为翻译活动的最高目的，关注翻译人在文化活动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这一翻译观念至少具备如下两大方面的价值：

第一，提升社会对翻译活动本质与价值的认识。

尽管翻译活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在现代社会各个学科知识的生发史上，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起到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没有对翻译活动进行过严肃思考和深入认识的业外甚至业内人，对翻译存在的价值是认识不清的。当下翻译学科地位大幅提升、翻译实践与研究成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翻译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无疑是一群对翻译本质与价值有着深刻认识的人奔走争取的结果。

纵观翻译实践历史绵长，译者、译作、翻译人才培养，连同翻译研究一起，长期以来难以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停留在语言对等转换的层面。将语言对等转换当作翻译本质，人们自然会生成诸如“懂外语就会做翻译”“译者不过是语言转换的工具”等过简的翻译认识，翻译之功用就只在满足一时的语言转换之需。

许钧秉持文化交流的翻译本质观，他关注语内翻译之于民族文化古今传承的功能，语际翻译之于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学习借鉴的功能，将人类文化的承继与发展视为翻译活动的最高目的。许钧不仅对此翻译文化价值深信不疑，同时也意识到将大众的翻译价值认识从忠实语言转换提升到了人类文化传承与发展高度的重要意义。为了帮助更多的翻译业内外人士在更高层面、更为宽阔的视野上认识翻译的本质与价值，许钧通过学术出版与发表、讲座等多种方式，论述翻译的本质及价值，揭示历史上著名翻译家、翻译活动的文化功用，呼吁社会对译作价值的认可，分享自己的翻译文化活动体验，引导大众关注生活中的翻译存在。《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2001）《翻译价值简论》（2004）《关于外语学科翻译成果认定的几个问题》（2017）《翻译是历史的奇遇——我译法国文学》（2017）《翻译的定位与翻译价值的把握——关于翻译价值的对话》（2017）《文学翻译、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以我和勒克莱齐奥的交往为例》（2018）《翻译精神与五四运动——试论翻译之于五四运动的意义》（2019）等，都是许钧上述实践与思想历程的记录，这些活动与成果也在业内外产生了显著影响。

第二，引导翻译从业者对自身翻译行为目的与价值发挥的认识。

在不少翻译从业人员在翻译工具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冲击之下倍感迷茫的时代，许钧的翻译文化价值观及伦理观为翻译从业者建立了翻译活动的目

标追求，也为翻译人如何认识并发挥人在翻译活动中的价值指明了方向。

翻译的目的，如前所述有高低之分。余光中按照境界论，说翻译“高，可以影响一国之文化。低，可以赢得一笔稿费”（147）。译者为生存计，通过翻译赚取稿费，本是天经地义。但是翻译目的如果仅停留在较低层次，面临的问题是多重的。一方面，我们很难想象仅为赚取稿费的翻译主体会突破文字转换层面，主动去思考并引人关注翻译选择涉及的社会与文化影响问题；另一方面，人类已经开发出多样的翻译工具，“将一些原本需要译者通过学习而内化的能力外化到技术设备之上”（蓝红军 69），翻译如果仅仅依靠文字转换彰显价值，生存只会愈发被动，体现价值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许钧将翻译的作用定位在“影响一国之文化”，为翻译从业者树立了崇高的奋斗目标。他并不排斥翻译技术，但坚信人的“创造性的思考”与“对未知的探索”不可替代。¹这实际在提醒译者在实践主体之外，关注自身作为“精神主体”的身份。树立崇高的翻译目标，译者才能将自身置于翻译活动的中心，注重自身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将自己“看作可以能动地作用于外在于人的语言和文本世界的人”，可以“通过翻译影响和改造他人的思想、实现自我精神追求的精神主体”，“可以主动地作用于他人和自我内在精神世界的人”。²许钧指出，“当翻译被置于文化的视野之下进行重新审视时，有关翻译本质、翻译目的与任务、翻译标准与策略、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等许多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得以在新的认识层面展开，可望有所突破，翻译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也有望得到科学的解释”（“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观”223）。这也为从事翻译实践、翻译批评、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的广大翻译从业人员如何在翻译活动中发挥主体价值提供启发：

（1）对于翻译实践而言，翻译价值立场、翻译目的、翻译方向、翻译选材、翻译人员、翻译策略、翻译方法、译本模态、承载媒介、出版机构等等，存在多样选择。翻译主体一旦对之形成自觉充分的认识，就能够在翻译活动中游刃有余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最大程度追求翻译活动价值的实现。

（2）对于翻译批评与翻译研究而言，可以跳出语言对等转换与翻译史实罗列层面，对探讨对象就上述方面做出了何种选择，内外部的影响因素为何，其选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文本内外部开展更多层次、更全维度的评判与探究。

（3）对于翻译教学而言，可以帮助翻译学习者树立崇高的翻译文化价值观与伦理观，在更高层面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与价值、把握人与工具的关系、了解翻译能力提升的方面与途径，明确未来发展的方向。

1 参见许钧：“数字化时代中华文化译介与创新——从翻译的创造性谈起”，《翻译研究》2（2023）：2。

2 参见许钧：“数字化时代中华文化译介与创新——从翻译的创造性谈起”，《翻译研究》2（2023）：2。

四、结语

翻译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人类语言活动。然而没有明确思想观念指导的翻译实践是盲目的。许钧关心翻译之微观的语言、技巧，却不止步于此；关注翻译的文化层面但无意于“操纵”“阻抗”和“暴力”。他在由技至道、由文本至文化的翻译实践与研究之路上践行并倡导其翻译文化价值与伦理观念。在翻译的文化价值上，许钧强调语内翻译之于民族文化遗产与发展的价值，语际翻译之于人类文明文化互鉴的价值；在翻译文化伦理方面，许钧倡导各族文化敞开自我，主动与“异”交流，主张翻译活动主体尊重翻译中所遇文化的他异性，以平等的态度与异语文化对话。许钧的翻译文化观以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最高目的、密切关注人在翻译活动中的精神主体在场，不但能够提升社会对翻译价值的普遍认识，为翻译实践、翻译批评、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等从业人员树立了崇高的理想，还为翻译从业者在翻译技术发展迅猛的当下如何发挥自身的翻译主体价值指明出路。

Works Cited

- Berman, Antoine.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translated by Stefan Heyvaert. New York: State U of New York P, 1992.
- 曹明伦：“文本目的——译者的翻译目的——兼评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和意大利谚语‘翻译即叛逆’”，《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4（2007）：1-5。
- [Cao Minglun. “Textual Purpose Is Translator’s Fundamental Purpose: On Skopos Theory and Italian Epigram ‘Traduttore, traditore’.”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4 (2007): 1-5.]
- Delisle, Jean and Judith Woodsworth.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2.
- 邓晓芒：《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 [Deng Xiaomang. *Paraphrase on Kant’s Criticism of the Judgment*.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Dunne, Geroge.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translated by Yu Sanle and Shi Rong.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
- [Fang Mengzhi.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1.]
- 季羨林：“序”，《中国翻译词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页。
- [Ji Xianlin. “Preface.” *A Companion for Chinese Translators*.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1997.]

蓝红军：“译者之为：构建翻译的精神世界——《傅雷翻译研究》述评”，《中国翻译》1（2017）：68-73。

[Lan Hongjun. “A review of Fu Lei’s Translation Studie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1 (2017): 68-73.]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Liang Qichao. *Eighteen Chapters on Buddhist Studie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Liu Junping. *A General Histor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Wuhan: Wuhan UP, 2009.]

刘军平、覃江华：《西方翻译理论名著选读》。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Liu Junping and Qin Jianghua. *An Antholog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Wuhan: Wuhan UP, 2012.]

刘云虹：“翻译价值观与翻译批评伦理途径的建构——贝尔曼、韦努蒂、皮姆翻译伦理思想辨析”，《中国外语》5（2013）：83-88+94。

[Liu Yunhong. “Translation Values and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Criticism Studies: Identification of Berman’s, Venuti’s and Pym’s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Ethic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5 (2013): 83-88+94.]

刘云虹、许钧：“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外国语》2（2016）：70-77。

[Liu Yunhong and Xu Jun.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An Interview on Translation Ethic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2 (2016): 70-77.]

乔治·穆南：“翻译与文化的多样性”，许钧译。《语言与翻译》4（1991）：73-77。

[Moonen, George.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4 (1991): 73-77.]

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Ren Jiyu. *Collections of Buddhist Thoughts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3.]

许钧：“文化“差异”与翻译”，《中国比较文学》1（1997）：67-78。

[Xu Jun.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Transl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1 (1997): 67-78.]

——：“在抵抗与考验中拓展新的可能——关于翻译与语言的问题”，《语言战略研究》5（2019）：5-6。

[—, “Exploiting New Possibilities in Resistance and Test: Questions about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5 (2019): 5-6.]

——：“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李伟国主编，《辞海新知7》。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2-10页。

[—, “The inescapable translation problems,” edited by Li Weiguo. *Cihai Xinzhishi* 7.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2001. 2-10.]

——：“我的翻译与研究之路”，《外语界》5（2018）：34-39。

[—, “My Experience of Transl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Foreign Language World* 5 (2018): 34-39.]

- : “中西古今关系之变下的翻译思考”, 《中国外语》4 (2015): 1+25.
- [—: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in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roughout History.”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4 (2015): 1+25.]
- : “文字·文学·文化——关于‘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1 (1996): 168-172.
- [—: “Tex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n ‘Text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1996): 168-172.]
- : 《翻译论》。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 [—: *On Translation*.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2006.]
- : “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 《中国比较文学》3 (2001): 82-92.
- [—: “Respect,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is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3 (2001): 82-92.]
- : “数字化时代中华文化译介与创新——从翻译的创造性谈起”, 《翻译研究》2 (2023): 1-7.
- [—: “Transl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Digital Era: On Creativit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Research* 2 (2023): 1-7.]
- : “翻译精神与五四运动——试论翻译之于五四运动的意义”, 《中国翻译》3 (2015): 5-12+188.
- [—: “Translation as a Spiritual Pursuit during China’s May Fourth Movement.”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3 (2015): 5-12+188.]
- : “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 《中国翻译》1 (2012): 5-12+122.
- [—: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ts Functions and A Possible Direction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1 (2012): 5-12+122.]
- : “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观”,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3 (2002): 219-226.
- [—: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Its Cultur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 (2002): 219-226.]
- 许多、许钧: “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3 (2015): 13-17+94.
- [Xu Duo and Xu Jun.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on 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3 (2015): 13-17+94.]
- 杨仕章: “文化翻译观: 翻译诸悖论之统一”, 《外语学刊》4 (2000): 66-70.
- [Yang Shizhang. “Views on Cultural Translation: Unity of Paradoxes in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4 (2000): 66-70.]
- 余光中: 《余光中谈翻译》。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年。
- [Yu Guangzhong. *Yu Guangzhong Talks About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2.]